

现代化视域下再考池田大作的中国观及其当代价值

孟芮竹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350)

[摘要]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立足于全球视野的西方现代化危机的背景下考察中国。20 世纪 70-90 年代, 他与世界知识分子进行对谈, 剖析西方现代文明中的困境, 多次访华探讨他对中国的认知。从传统向现代演进的线索缕析其诸多论述, 可以看到池田大作中国观的多重面向: 一方面, 池田大作关注到中国“以人为本”历史传统理念的现代意义, 另一方面, 他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基于传统进行史观上的思想革命、注重民众与政党自身的精神变革、顺应时代所需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以捍卫主权统一和发展自主性的原则开创多元价值的现代化表示赞赏。池田大作从时空维度明晰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 阐释了中国传统中的精神智慧具有超越于西方现代化的可能, 从人类文明演进的视野剖析了中国共产党对“以人为本”传统的延续。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走自己的路、必须坚持以“第二个结合”为理论指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予以一定启迪和借鉴。

[关键词]池田大作; 中国观; 以人为本; 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B305

[文献标志码] A

20 世纪 70 年代, 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探讨西方现代化危机时, 将对人类文明未来的期许转向了东方传统。汤因比指出, 中国将是“统合未来世界的主轴”, 池田大作也认为东方传统将在 21 世纪展现其雄姿, 成为指导“人类文明”的“光明”^[2]³⁴⁷。池田大作为何得出这一结论? 中国传统中有哪些精神元素克服西方现代化的危机、引领人类文明通向光辉的未来? 尽管以往学界以池田大作与中日友好为中心, 探讨池田大作中国观的研究颇丰^①, 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亟需从应对西方现代化危机的视域下再次考察池田大作的中国观, 以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如何立足于传统、实现对西方现代化的扬弃和超越的时代课题。此外, 1974 年池田大作首次访华, 在归国后撰写的回忆录《中国的人间革命》, 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建设有过诸多论述, 有一定史学价值, 但目前学界内研究多关注于池田大作汉语版论著, 对日文原著的考察有所欠缺。因此, 本文尝试从传统向现代化演进的线索, 梳理池田大作关于中国历史传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知, 进而基于现代化的视域剖析池田大作中国观的当代价值。以期借池田大作的异域思考, 从人类文明演进的时空视野, 揭示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具有超越于西方现代化的可能。

一、池田大作中国观的考察维度

池田大作对中国的关注是在西方现代化面临危机的背景下展开的。20 世纪 70-90 年代, 池田大作曾与世界知识分子探讨 21 世纪人类文明的前途命运, 剥茧抽丝、层层深入地缕析何为现代化、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的主要弊病、以及所处危机等问题。

[基金项目] 周恩来与池田大作的精神对话, 日本创价大学中日友好合作项目, 2023-2024。

[作者简介] 孟芮竹,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

^① 代表性著作及论文参见孔繁丰、纪亚光. 周恩来、池田大作与中日友好[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李锦坤、刘玉珊. 池田大作与中国,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杜海怀、廖承志、池田大作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华侨大学学报[J]. 日本问题研究, 2008(3)等。此外, 为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和“池田倡言”发表 50 周年, 中日学术界举办了“推动构筑新型国家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研讨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与实践”国际研讨会、“日中新时代论坛”等研讨活动, 研究呈现大观之势。

首先，池田大作曾与莫斯科大学校长沙德维尼兹探讨“现代化”的内涵。沙德维尼兹指出，“现代化”（法语 *moderniser*）一词具有“配合现代要求加以改变”之意，在不同时期其内涵不断变迁。“现代主义”在一百年前作为欧洲艺术出现新潮流时使用，进入 20 世纪后半用于传统宗教观对近代科技做出的让步，直至 20 世纪末以后泛指以西方传统价值观为基础的世界全球化。池田大作对此表示赞同，并认为，尽管“现代化”有多重解释，其探讨的共同课题是“与封建性诀别”^{[3]184-185}。其次，池田大作指出 20 世纪末以后世界的“现代化”由西方主导——即“西方中心论”。池田大作将西方现代化喻为无法逃避、具有世界化倾向的“力学”，其他文明只能被迫接受。对于其成因，池田大作提出，这一“力学”背后的推力是现代化科技。由于“科技追求方便和效率，与人性‘安乐导向’气味相投”，从而使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迅速延伸向世界^{[3]174-175}。再次，池田大作认为，西方现代化呈现出均质化和排他性的弊病，使世界陷入人性危机。一方面，他指出：由于西方现代科技文明带来的物质繁荣迎合人性的物欲与野心，且其他文明无法与之相竞争，因此世界的现代化趋于均质，倾向于附属西方主导的现代化^{[3]185-186}。另一方面，西方现代化具有排他性，与融入现代化的“民族的多样性以及人性化的世界”产生冲突。^{[4]36}他认为，欧洲知识分子不仅尖锐批判西方传统，对异质文化也难以采取折中的态度——或是全盘抛弃欧洲传统以求同化于东方、或是完全拒绝东方传统文化，两者必取其一^{[4]42}。最后，池田大作对西方中心论予以批评与反思。池田大作曾借用法国诗人 P·梵乐希的论述，批评“欧洲精神”所到之处呈现了欲望、工作、资本、生产效率、野心、权力、自然环境破坏等极限^{[3]175}。池田大作强调，在现代化迅速蔓延至世界的当代社会，辨明西方和东方的各种传统文化，继承优点并抛弃弊端，在扬弃中创造可称之为‘人类普遍的思想’，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4]42}

因此，在西方现代化面临危机的背景之下，池田大作对人类文明的期许由西方转向了东方。为避免现实的“人”陷入现代化的困境，规避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均质化和排他性局限，池田大作在中国的现代化中探寻良方。自 1974 年以来，池田大作曾十次访问中国。在访华期间，他与中国领导人、政府要员、民众进行广泛交流，并在中国大学发表演讲，探讨中国人、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等问题^[5]。由于池田大作对中国的考察是出于对西方社会中“人”的境遇的关注下展开，因此其论述多集中于两方面：其一，“以人为本”理念是中国历史传统的核心命题，也是中国留给现代人类文明社会珍贵的精神遗产^②。其二，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扎根于传统，“为人民服务”领导中国成功践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指出，“新中国一贯坚持的提倡‘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我在内心里对这一事实刮目相看”“这里正酝酿着开辟历史的、新的民众形象。”^{[7]74-75}“中国通过建立共产党的统治体制得到了政治上的稳定”“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实行计划经济，强有力地推进了社会资本的积累”。因此，中国避免了像印度和西亚国家效仿西方现代化时出现的弊病，没有陷入由于政治不稳定和资本的积累不足陷入发展停滞的^{[2]269}。

综上，如何使“人”摆脱西方现代化遭致的现实困境、推进人类文明通向真正的现代化，是池田大作考察中国的起点。正因为如此，现实中的“人”成为贯穿池田大作对中国历史传统与现代化实践认知的主线。

二、现代化视域下池田大作中国观的主要面向

诚如池田大作所言，现代化“本身就不是对传统的否定，而是必须在与传统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的过程中，探索未来的社会。”^{[4]44}以传统向现代演进的线索梳理池田大作关于中国的诸多论述，可以看到池田大作中国观的多重面向。

（一）“以人为本”的中国历史传统具有缓和国际局势的现代意义

^② 在北京大学的三次演讲（1980、1984、1990 年）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演讲（1992 年）中，池田大作均强调了这一点。

如上所述,池田大作将“以人为本”理念视为中国历史传统中的核心命题。由于池田大作对中国传统的认知是理解中国向现代化过渡的前提,因此有必要明晰其内涵。具体而言,池田大作对“以人为本”的传统理念的探讨包含三个层面:

其一,强调“人”对自身的规范修养与自我革新。池田大作曾以“中庸”思想为例探讨中国传统中“以人为本”理念。他指出,贯穿中国历史的“中庸”思想其内涵为人在喜怒哀乐之前内心的中正和平静,由此使“束缚人及其行动的不正的情念无隙可入”,让每个人感受到心灵深处返璞归真的“人本主义”的律动^{[4]2}。池田大作认为,中国历史传统中“自”的概念是指人的自律,具有一定自省与革新的基调。例如,中国的“为己之学”在于学问“并不是因他人强迫而致力”,而是“以自我认识、自我理解为第一要义”^{[6]102}。其二,以“人”的维度践行一切规范的正确与否。池田大作认为,中国的宗教、科学、政治等学问都是以人为出发点,以探索人生为目的展开,是人依据现实的经验主动认识与人相关的一切事物,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践以改造现实。例如,对于中国人看待“天”这一概念,他指出,“‘天’不是作为先验的存在”“而是在经验中与人相接,为人所究问”^{[7]83-84}。其三,不仅限于“人”对自我的规范和革新,同时向“他者”拓宽,促使整个社会形成伦理化的文明秩序。池田大作指出,在中国“卷叠浩繁的史书中”,可以发现“其中处处充满着伦理性和伦理感”^{[7]80}。在池田大作看来,这种伦理秩序感使中国形成以文化、文明抑制武力作用的传统力量。他说:“人或国家控制其自身本能和兽性的文明力量——亦即自制力或意志力”,是中国文明美的本质体现^{[7]82}。

在池田大作看来,中国历史传统中“以人为本”理念具有现实意义。在1991年澳门大学作的《通往新世界秩序之道》演讲中,池田大作谈到,在意识形态对抗终结之后,取代以往的美苏体制、开辟人类融合之路的新秩序尚未形成,国际局势依然处于内部秩序混乱的失序状态,需要包容开放的人类意识以代替原有植根于人们内心深处的民族意识。池田大作指出,他在中国历史传统中看到形成这种人类意识的精神萌芽——“我不能不注视在中国数千年文明里如地下水脉一般源源流淌的传统的世界秩序感觉”,“这大概与揭扬仁、义、礼、智、信‘五常’为宗旨的东亚大学建学精神也一脉相通。”^{[8]101-105}由此,中国历史传统中规范“人”行为的“仁义礼智信”五常学说将在缓和后冷战时期国际局势、构建人类文明新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 中国的现代化注重思想观念对人的影响,变“帝王史观”为“民众史观”

池田大作不仅关注中国传统理念中的现代意义,也对传统中禁锢人思想的一面进行分析。前文谈到,池田大作所探讨的“现代化”意味着“与封建性诀别”。因此,在池田大作看来,中国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过渡同样需要面对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在民众心中根深蒂固的问题。他曾说,20世纪之后“中国的几次革命目的是为了打倒殖民统治,同时也是为了推翻像‘沉疴宿疾’一样不断腐蚀民众心灵的封建制度。”^{[9]115}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封建思想的形成原因,池田大作将其归结为是由于传统文化与皇权相结合。他指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来源于为官治学,后来沦为皇权进行统治的工具,以致“固定了既存的等级制度,使社会停滞不前”。因此,自五四运动以来,孔子之学中的封建残余多次遭到猛烈的批判。在池田大作看来,造成这种弊害的主要根源在于“汉代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术国教化。”他认为,正是这些遗留下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有维持古代秩序、固化阶层身份的倾向”,成为中国革命的障碍^{[10]169-170}。必须指出的是,传统文化与权力相结合以致陷入脱离民众的深渊是人类历史上的通病。在池田大作与汤因比对谈中他也谈到,“因为像罗马天主教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任何宗教一旦与权力相勾结,变成御用宗教,便会忘却了扎根于民众间的清纯初衷。”^{[2]450}

对此,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极其重视思想对民众的影响,引导中国民众在史观层面上从“帝王史观”变为“民众史观”。1974年池田大作首次访华之后曾在回忆录《中

国的人间革命》中借埃德加·斯诺的观点，从中国领导人的立场出发探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王侯贵族和不停劳动建设社会的百姓哪一类人更尊贵呢？年轻毛泽东的内心，一定坚信真正建设社会、创造历史的平凡人是新时代的主角。这其中彰显了浓厚的人道主义气息。”^{[10]34} 同为社会革命的领导者的池田大作切身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推进民众思想观念的变革，他认为：“思想这种东西有很强的根性。不管社会如何变化，它都在人心中继续存在。无论怎样的社会变革终究是落实到思想的变革，如果在思想层面不能彻底变革，为人设计的制度也不能奏效。”^{[10]169-170} 之后，1980年和1984年池田大作在中国大学发表演讲时，谈及新中国的民众史观及其重要意义。他指出，“新中国一贯坚持的提倡‘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我在内心里对这一事实刮目相看。正因为这里正酝酿着开辟历史的、新的民众形象。”^{[11]74-75} 他认为，中国领导人主张的“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是为人民服务的“民众史观”，这种史观与儒家传统的“帝王史观”迥然不同。新中国的“民众史观”将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主体，“着眼于人应该怎样生存这个非常主观的、充满伦理性的问题”，以史为鉴，探讨在当下与未来的生活如何改进^{[12]89-91}。

（三）中国的现代化根植于中国历史传统，注重民众和政党自身的精神变革

基于池田大作在20世纪70-90年代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论述，可以探析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理论与实践的特征。在池田大作看来，中国共产党根植于“以人为本”的传统理念践行现代化建设，注重民众和政党实现精神的自我变革。

在指导思想，池田大作认为指导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学说根植于东方传统精神。1968年池田大作在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指出：毛泽东主义“虽是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但继承了东方传统的精神主义的血统。”^[13] 在此，“东方传统的精神主义”的含义意味着前文所探讨的中国传统中强调“人”的自我规范、通过实践验证与人有关的一切观念和事物、进而将自我规范拓宽至“他者”形成伦理秩序。1974年池田大作在首次访华后撰写的《中国的人间革命》回忆录中指出，思想如果脱离行动就是“死的哲学”，而毛泽东思想是“活的哲学”“行动的哲学”。“毛泽东主席这个人，当然本身就是行动的毛泽东思想”，“与一介庶民并肩行走的人格所铸就的耀眼思想，不能轻视”^{[10]129}。因此，池田大作探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精神变革，具有不断自我变革的人格主义特征。在此，精神变革意味着思想与行动紧密相连，以思想变革引领实践运动。

在实践方式和主体上，中国共产党主张的以“人”为中心的变革，以精神变革引领社会化的革命实践，其主体不仅限于民众，还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者本身。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众进行自我变革。池田大作曾在回忆录中谈到，毛泽东领导的革命运动“都是回到‘人’”，特别是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发掘革命中人的内核，将这一内核向全中国扩散，与农民联合巩固信任。”^{[10]63-64} 此外，1997年池田大作与金庸对话时也提到，新中国诞生为止呈现一片生气勃勃的向上精神的气息——“为了正义、平等、自由和人的尊严而战斗，然后以唤醒的中国农民的意识 and 力量，令沉睡两千年的中国从沉睡中觉醒过来...”^{[14]221}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民众的精神变革，政党自身也自律革新。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取得民众的信赖是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用“严以律己的纪律来校正党风”，这是中国人重视、深化精神提升以致力于新中国建设的体现^{[14]81}。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主张批评与自我批评，主动接受大众的批评与监督以预防政党在规模扩大后可能出现的官僚主义^{[10]157}。领导干部定期去干部学校劳动、学习、感悟革命的原点，尝试打破对组织机构官僚化、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区别对待观念^{[10]171}。

（四）中国历史传统中蕴含的辩证思维，规避了马克思主义陷入教条化的弊病

池田大作曾分析苏联式马克思主义在指导实践中脱离人民的现实需要，陷入教条主义的问题。他认为马克思本人的学说在欧洲诞生时，是极具尖锐的批判性、深深贴近于现实民众的思想。他指出，一种思想作为社会警钟被提出时必须具有锐利的批判精神，“费尔巴哈和萨

特之所以倡导包含对宗教、尤其对基督教批判内容的人道主义，是由于他们所观察到的社会暴露出基督教对人性的压抑。可以说，马克思的情况也与此相同。”^{[4]93}但是，苏联式“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脱离民众的教条主义倾向。池田大作指出，“如果马克思主义国家不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教条，能够适应时代的变化，实行符合人民要求的政治，马克思主义会在历史上为其人民作出值得高度评价的贡献的。假如说马克思主义与现在所称呼的马克思主义完全不一样，那应该说它比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要大大地接近于马克思所怀抱的理想。”^{[14]172}

对此，池田大作认为，中国“以人为本”的传统理念中蕴含的辩证思维，使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规避了马克思主义陷入教条化的弊病。一方面，池田大作曾谈到，“儒教是完全的合理主义的政治哲学，也可以说是人生哲学”^{[2]272}，“儒教这种非宗教精神的、合理主义的思维传统”，可能有助于接受马列主义^{[2]274}。换言之，中国传统中对“人”的自律与自我规范的生活方式易于革命年代中国社会接纳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中国“以人为本”传统理念中的自省与革新、通过实践验证一切观念的思考范式^③，使中国规避了苏联式马克思主义陷入教条化的问题。1974年池田大作在访华回忆录中谈到，“毛泽东排斥教条主义的机构改革，经常重视以人的思想变革为实现革命的重要因素。”他认为，1937年以后的人民教育、1941年的整风运动等学习运动，是以《实践论》《矛盾论》为基础展开的“努力于以理想的人类形象为目标的思想变革”。“这种思想变革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信念——不管进行怎样的社会机构改革，在这一环境的人如果出现怠惰、利己主义，就不能实现革命，革命成果会崩溃。”^{[10]243-244}

不仅如此，中国“以人为本”传统理念中蕴含的辩证思维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也发挥重要价值。1994年池田大作在深圳大学发表演讲中指出，中国包容观念与社会融合时出现的矛盾，并通过实践摸索更好的答案，体现了“通达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一种正反合‘辩证法’的全体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在以人为中心的“辩证法的全体观”之下，中国为谋求社会安定和发展所作的智慧选择^{[13]128-129}。

（五）中国延续“巩固边境、专心内治”的传统方针，开创多元价值共存的现代化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关系方面，池田大作也有过诸多论述。池田大作基于中国的国情和历史传统，将内政与外交联系起来考察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原则。他认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庞大、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历任当政者都需要面对内部治理的难题——如因自然灾害出现的难民和暴民问题、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以及地域贫富差距过大等矛盾。由于特殊的国情，“巩固边境、专心内治”成为中国传统的政治方针^{[10]239}。正因为如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资本主义的压迫、西方列强的殖民政策和军事侵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将实现民族的独立与统一视为最重要的战略任务，通过运用民族主义的团结，从城市中撤离，联合农村中人民群众的力量与之对抗^{[10]242}。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美苏两极格局的背景之下，处于共产主义阵营的中国提出“世界革命”的主张，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时常受到孤立无援，被世界视为和平的威胁。对此，池田大作认为，中国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外交方针，是基于国际局势的变化，为保卫国家的独立与安全，应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包围主义所出的防御反应^{[10]240}。因此，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基础。1974年池田大作在访华期间对中国的工业和农业现代化模式表示赞赏，认为中国的工业建设是按需要导入技术的自力更生的工业化模式，“始终是中国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的表现”^{[10]183}。他指出，中国“以农业为基础推进轻工业、重工业发展”，是“切实的、立足长远的建设”^{[10]85-86}。在外交方面，中国尝试独立于西方主导的侵略扩张的现代化模式，开创多元价值共存、对外和平友好的文明篇章。池田大作认为，以往人类史以西欧价值观为主导，将亚非拉强加在“文明版图”之中，而“新中国的走向是想开启一条包含多元价值观的共存之道”。池田大作称这条道路是一条“新路”，中国

^③ 本文第二节第一部分对池田大作关于中国“以人为本”传统理念的认知进行过分析。

向人类展示这条新路是人类文明的“伟大实验”^{[10]61-62}。

在 20 世纪末的世纪之交，池田大作在与路奈·尤伊古的对谈中再次谈到中国的对外交往原则。他说：“这不是凭藉武力的压迫、称霸——即所谓的霸道，而是基于‘王道’的理念所实现的调和。”在池田大作看来，这种交往原则源于中国数千年作为统一国家的历史传统。他指出，尽管中国“曾有过数次统一体制的崩溃，但作为统一体的理念始终是存在的”，因此，对于未来必然要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某一统一体制的人类社会而言，中国多元价值共存的对外交往理念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15]169}。

三、现代化视域下再考池田大作中国观的当代价值

站在 21 世纪的今天，重新考察池田大作在西方现代化危机的背景下，以现实中的“人”为中心，关于中国历史传统、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代化建设的诸多论述，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一）从时空维度明晰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走自己的路

目前学界内关于西方现代化问题的分析，多从资本逻辑对人的异化、或西方在全球展开殖民扩张过程中压制其他国家发展模式的空间维度来解读^④，池田大作关于“现代化”的探讨，为理解西方现代化的问题开启了时空的视野。

对于西方社会对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拒斥、以及世界的现代化受西欧冲击呈现均质化倾向，一方面，池田大作将“与封建性诀别”作为划分传统与现代的界限，指出西欧优先于东方进入现代化，明晰了西欧社会率先进入了“现代”的时间。这意味着，率先进入“现代”这一时间场域的西欧对同时期非西方传统社会中的封建性进行批判，占据了“现代化”话语的主导权。沙德维尼兹曾谈及池田大作以“时间”掌握传统的重要观点——“当我们思考‘传统’与‘近代化’时，除了感受到各种概念和某些地理的扩充有关，同时也直接感受到‘时间’的现象，以及传统与近代化皆以不同的方法与时间有关。”^{[3]186}另一方面，由于现代化率先从欧洲兴起，因此欧洲很难与自身社会的传统文化相割裂。西方现代化通过建立现代国家，以及调整涉及行政、经济、教育等方面的理性秩序，在为人们带来物质恩惠的享受的同时，使西方现代国家沦为贯穿理性秩序、受物质需求驱动的机器^{[4]41}。尽管自 20 世纪末以来，西方知识精英展开对近代理性主义、进步史观的“自我批判”，但触及根植于社会中生活方式、文化观念的批判依然困难重重。正因为西欧传统具有如此顽强的韧性，“自我批判”成为西欧对待自身传统的态度。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当代西方知识精英无法忍受异质文化的纠葛，形成“亲华派”和“厌华派”阵营^⑤，以“二元对立”的态度对待其他非欧洲历史传统，且自身难以从中摆脱出来的原因。池田大作指出，由于人性趋利、安图享乐，以致非西欧国家纷纷效仿西方现代化。换言之，后发国家试图进入西方所谓“现代”的时间。但是，如果抛弃自身传统，只能重复西方“现代”时间场域中人性私欲膨胀的循环。由此可以看出，“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为从西方“现代”的时间摆脱出来，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走自己的路。

（二）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必须以“第二个结合”为理论指引

如上所述，西方率先进入了“现代”的时间场域，后发现代化国家为赶超西方国家试图融入“现代”，但无法从西方现代化的弊病中摆脱出来。沙德维尼兹与池田大作探讨“传统”与“现代”之间存在的“内在时间”时谈到，“‘传统的复兴’或‘回归传统’，有时则指着过去未曾有过的某些‘新事物’”“是‘新传统产生’”^{[3]187}。池田大作探讨中国“以人

④ 代表性的论文成果有：；张亚泽、张固宁.从资本逻辑到人本逻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性超越[J].社会主义研究,2022(6)；梁波.西方现代化:过程、特征与问题.科学社会主义,2023(2)；王贵贤.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国观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4(1)等。

⑤ 这也是很多学者认可并接受的分类方法，尽管较为简单，但却能够较为明确地展示对待中国问题的基本立场。参见赵敦华.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性,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2)。

为本”传统理念中缓和后冷战时代国际冲突、以及构建人类文明新秩序中的现代意义，正是为从中国传统中探寻克服排他性与均质化局限、超越于在西方“现代”这一时间场域中人性私欲膨胀的可能性。

因此，池田大作关于中国“以人为本”历史传统的论述带来的又一启示是，中国历史传统中蕴含着弥补西方现代化危机的精神智慧。可以从两方面来检视：其一，从思维模式上，西方传统的思维模式是“分析”，而东方传统的思维是“综合”。尽管近代以来，西方“分析”思维推进了科学、技术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但运用在与自然、生命等关系方面则表现为侵略破坏、或只注重肉体而忽视精神^{[5]164-165}。由此，非此即彼、“二元对立”成为西方现代化的惯性思维，西方国家在伴随资本扩张与异质于自身民族的文化、文明相接触时呈现出鲜明的排他性。而与之相对，中国传统理念主张“以人为本”，即注重人与人、自然、宇宙等与人相关一切事物之间的协调共生。在东方传统“综合思维”影响下，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强调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文明新秩序，弥补了由西方现代化排他性衍生出来的民族、宗教、文明之间冲突的问题。其二，从价值论上看，作为西方现代化价值基础的基督教伦理已经失去了指导力，造成了价值层面对生命的阙如。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在理性主义的驱动下，终于从基督教的压抑中解放出来的“人”，一方面获得支配自然界万物的自由与权利，另一方面拒斥曾强制运用权威压抑自由的宗教教诲^{[4]75}。而中国“以人为本”历史传统强调人的自省、在实践中革新、以及人对“他者”的规范，孕育出克服私欲的东方理性主义的萌芽。根植于传统的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注重民众和政党的思想变革、坚持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进而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弥补了西方现代化在价值论与存在论无法调和的局限。因此，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将其写入党二十大报告、进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意义，在理论层面上为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于西方现代化的局限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指引。

（三）中国共产党始终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进步，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主体——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16]池田大作为理解这一论述提供了一种异域思考：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由于根植于中国历史传统，避免了苏联式马克思主义陷入教条化脱离人民的弊病。在池田大作与戈尔巴乔夫的对谈中曾谈到，苏联的历史传统是作为基督教异端的东正教文明。因此，苏联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一样，难免于受到宗教“外在的规范”的限制^{[17]300}。这意味着，宗教拥有全知全能的“神”——上帝，衍生出世界观上的唯我独尊。如果这一观念的链条在西方现代化中形成支配人精神世界的“拜金主义”，那么在苏联式现代化中则以“意识形态”表现出来。池田大作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仅只停留在政治、经济等形而下的水准上，在思想、信条、良心等形而上的水准上，也可以说是有意把他们置于绝对支配之下”^{[17]299}。由此，苏联式马克思主义陷入支配色彩的教条化与人民越来越远。而与苏联历史传统不同的是，中国历史传统是探讨关于“人”的学问。其中的伦理规范可以说是充满自省、自我变革的“内在的规范”。以此为基础，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关于“人”的精神变革与现代化实践。换言之，现实中的“人”是贯穿中国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主线，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主体——中国共产党，扎根于中国独特的历史传统，领导人民进行思想革命、践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从史观上看，近代之后西方的史观是历史主义，尽管“在实证与客观方面是有其一定的卓越成果”，但主要探讨“某种规律”，以致“断绝了跟人的活生生的关系”^{[18]89-90}。而中国的历史传统崇尚“尊重历史、以史为鉴”，探讨现实中的“人”如何实现更好的生活^{[18]87}。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基于“以人为本”传统理念主张民众史观，将所有民众视为世界历史的主角。池田

大作指出,这意味着两层含义:“在纵的一面,我们应该树立起自立的形象;在横的一面,人与人之间、世界的市民与市民之间,应该团结起来”^{[18]91}。

总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破除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摆脱了西方现代化由宗教传统衍生的“外在的规范”,回归到现实中人的“内在的规范”。以民众史观将全人类的共同命运联系在一起,跳脱出西方“现代”的时间场域,从世界史的“传统”中寻求实现全人类进步的宝贵经验,探讨人类如何走向未来。因此,根植于中国历史传统的中国式现代化其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始终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进步,实现真正的人的现代化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N]. 人民日报(1), 2023-2-7.
- [2] 池田大作、汤因比. 选择生命——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M]. 冯峰, 雒雪艳, 孙彬,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 [3] 池田大作、沙德维尼兹. 新人类、新世界——畅谈教育与社会[M]. 台湾: 中国文化大学池田大作研究中心, 2006.
- [4] 池田大作、狄尔鲍拉夫. 走向 21 世纪的人与哲学——寻求新的人性[M]. 汪淳波,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 [5] 纪亚光、孟芮竹. 池田大作对中华文明现代性的阐释及其当代价值. [J]. 日本问题研究. 2024(1): 61.
- [6] 池田大作. 教育之道, 文化之桥[A]//我的中国观[M]. 卞立强, 译. 四川: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9.
- [7] 池田大作. 走向和平之康庄大道[A]//我的中国观[M]. 卞立强, 译. 四川: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9.
- [8] 池田大作. 通往新世界秩序之道[A]//我的中国观[M]. 卞立强, 译. 四川: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9.
- [9] 池田大作. 21 世纪与东亚文明[A]//我的中国观[M]. 卞立强, 译. 四川: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9.
- [10] 池田大作『中国の人間革命』[M]、東京: 毎日新聞社、1974 年.
- [11] 池田大作. 寻求新的民众形象[A]//我的中国观[M]. 卞立强, 译. 四川: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9.
- [12] 池田大作. 人才是创造历史的主角[A]//我的中国观[M]. 卞立强, 译. 四川: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9.
- [13] 池田大作. 中国问题正是实现世界和平的关键[A]//我的中国观[M]. 卞立强, 译. 四川: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9: 6.
- [14] 池田大作、金庸. 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与池田大作对话录[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15] 池田大作、路奈·尤伊古. 黑夜寻求黎明[M].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3.
- [16] 习近平. 习近平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 人民日报(1), 2021-7-7.
- [17] 池田大作、厄尔巴乔夫. 20 世纪的精神教训[M]. 孙立川,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 [18] 池田大作. “人本主义”大地万里无垠[A]//我的中国观[M]. 卞立强, 译. 四川: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9.